

机会型危机下城市协作治理的三维协同机制构建

——基于淄博烧烤的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崔梦欣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6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5日

摘要

随着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由网络流量引发的“机会型危机”成为城市治理的新型挑战。本文以2023年“淄博烧烤”现象为案例，构建“催化型政府－敏捷性工具－涌现性社会网络”三维协同框架，探究无预案、零基础情境下城市协作治理体系的快速生成机制。研究发现，淄博的成功源于政府从管控者向战略催化者转型、治理工具实现敏捷化升级和社会网络涌现出的多元扁平结构，这三者共同形成的“催化－敏捷－涌现”动态回路，帮助淄博政府实现了高效协同。本研究拓展了危机协作理论的应用情境，为数字时代城市应对网络流量带来的“机会型危机”提供了理论解释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机会型危机，城市协作治理，三维协同机制，淄博烧烤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istic Mechanism for Urb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Opportunity Crises

—A Public Management Case Analysis of Zibo Barbecue

Mengxin Cui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August 16, 2026; accepted: October 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opportunity-based crises” caused by network traffic have become a new type of challenge in urban governance. This paper uses the 2023 “Zibo Barbecue” phenomenon as a case study. It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framework—catalytic government, agile tools, and emergent social networks—to explain how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s can be rapidly generated without pre-planning.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Zibo’s success stems from the government’s shift from controller to catalyst, the agile upgrading of governance tools, and the emergence of flat social networks. These elements form a “catalysis-agility-emergence” dynamic loop enabling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crisis collaboration theory, providing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cities to deal with “opportunity-based crises” caused by network traffic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Opportunity Crisis, Urb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Zibo Barbec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数字媒介的深度渗透，应对流量带来的挑战已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的新常态[1]。以抖音、快手、小红书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凭借“短平快”的传播能力，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将一个地方性事件、一种消费现象甚至一座城市推至全国舆论的中心，例如重庆的“洪崖洞”，西安的“不倒翁小姐姐”，再到2023年现象级的“淄博烧烤”，不仅为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曝光度与发展机遇，也对其治理能力构成了严峻考验。

这种“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新型城市挑战，与公共危机管理领域长期关注的“威胁型危机”形成鲜明对照。国际危机研究学者 Ben-Yehuda (1999)曾系统提出“机会型危机”(opportunity crisis)概念，指出此类危机由正面机遇而非负面威胁引发，其起因、过程与终结具有独特逻辑[2]。借鉴这一概念框架，本研究将此类由社交媒体引爆、以瞬时流量冲击为特征的城市治理挑战，界定为一种新型的“机会型危机”。

这类新型“机会型危机”颠覆了传统公共危机的应对逻辑，与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具有明确预警期和成熟预案的传统危机不同，流量冲击型危机具有突发性强、无预设预案、时间压力极端的特征。2023年春季的“淄博烧烤”现象，是这一新型危机的极端典型案例。但它在短短数周内做到有序疏导交通，市场监管到位，市民们也积极自发参与，更是获得了无数游客的好评，形成了高效运转的协作治理体系。这一看似“举重若轻”的成功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治理逻辑？面对没有预案、没有专业网络的“机会型危机”，淄博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响应与有效协作的？其中是否存在一套系统性的、可被辨识与阐释的协作生成机制？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2. 理论基础

2.1. 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理论

协作治理理论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管理变革研究，其核心内涵是打破单一主体的治理壁垒，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协商与合作，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3]。随着公共危机

复杂性、跨界性的不断提升，该理论逐渐成为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核心分析框架[4] [5]。

2.2. 机会型危机

“机会型危机”(Opportunity Crises)由 Hemda Ben-Yehuda (1999)系统提出，核心内涵是指那些兼具风险压力与发展机遇双重属性的危机类型，区别于传统纯负向危机，这类危机的爆发并非仅仅带来损害，更蕴含着发展机遇的可能性[2]。该理论提出后，逐步被应用于国际关系或公共政策等领域，如慕尼黑事件等经典案例研究，都体现出了机会型危机中“危机即机遇”的核心逻辑。

2.3. 三维协同的理论整合基础

本研究的“催化型政府－敏捷性工具－涌现性社会网络”三维框架，并非凭空建构，而是根植于多个理论传统的交汇地带。本节依次阐述与三个维度直接相关的理论来源，并说明每一理论在本框架中的具体适用方式。

网络治理理论(Network Governance)理论主张，在复杂的公共事务领域，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威中心，多元行动者可以通过基于信任、信息共享与互惠协商的非层级化结构实现有效协调[6] [7]。与传统的科层制协调机制不同，网络治理强调的是主体之间的横向联结与平等互动。这一理论为分析淄博案例中市民、商家、游客、网红博主等多元主体如何形成自发的协作结构提供了基本概念工具。

复杂性科学中的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y)为解释协作体系的整体生成提供了逻辑思路。复杂性科学指出，复杂适应系统在面临外部压力或环境变化时，其微观单元之间的局部互动可能自发地产生出宏观层面的新秩序，这一现象被称为“涌现”[8] [9]。涌现秩序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并非由任何中心节点预先设计或指令驱动，而是源于大量行动者在特定规则与信息条件下的适应性行为。这一视角为理解“无预案、零基础情境下协作体系何以能快速形成”提供了最核心的解释逻辑——协作秩序并非被“建造”出来，而是在条件具备时从社会互动中“生长”出来。

3. 文献综述

3.1. 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理论发展与路径探索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传统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以“减损与恢复”为核心目标，需要依赖于预设的应急预案、清晰的权责划分和既有的专业协作网络[10] [11]，尚未探讨在无成熟预案、无既有协作网络、时间压力极端的情境下，协作治理体系如何快速生成，这也成为协作治理理论在数字时代城市危机治理中延伸应用的核心要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主要在政府角色、治理工具、社会网络三个核心要素展开探索，一部分研究聚焦于政府角色的研究，如 Boin (2005)等学者构建的框架，深刻剖析了危机中领导力、沟通、决策与资源动员的核心作用[12]。另一脉络则关注危机中的社会网络分析，如丁会彤(2024)以郑州“7·20”暴雨事件，探讨了公共危机事件中各主体紧密合作所构成的协作网络在危机管理中的优势[1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危机中的工具与技术创新，特别是数字工具如何赋能实时信息感知、资源调度与公众沟通，从而提升响应的敏捷性(如对“智慧应急”平台的探讨)。这些研究分别揭示了危机中的有效协作的某一关键方面，但很少有研究将“政府角色”“具体工具”与“社会网络”这三个维度置于同一动态框架内，系统探究其在极端时间压力下如何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催生出一个全新的协作体系，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切入点和框架构建的关键方向。

3.2. 机会型危机的理论内涵与研究进展

国内学界对机会型危机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少量应用研究集中于

企业管理领域，主要探讨企业如何借助机会型危机实现战略转型，但是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应用极为匮乏。仅有部分研究间接提及，数字时代城市面临的网络流量冲击、突发公共事件等存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特征[13]，但尚未将其明确界定为城市治理领域的机会型危机，也未针对城市治理的场景，系统阐释机会型危机的特征或治理逻辑。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虽为理解危机协作提供了基础，但对数字时代“机会型危机”这一特殊类型及城市协作治理的具体内在生成机制，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整合与过程性解释。基于此，本研究以淄博烧烤这一数字时代城市机会型危机的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将协作治理理论与机会型危机相结合，基于现有的一些碎片化研究，将其整合构建为“政府角色催化-治理工具敏捷-社会网络涌现”的三维协同分析框架，系统探究机会型危机下城市协作治理体系的快速生成机制。

4. 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研究整合现有研究中政府角色、治理工具与社会网络三大核心要素，构建以“催化-敏捷-涌现”为核心的三维协同分析框架。在突发网络流量引发的新型“机会型危机”中，有效的协作治理体系并非预先存在，也无法通过单一举措构建，其生成与运转依赖于政府角色、治理工具与社会网络三大核心维度的针对性转型，以及各维度在极端时间压力下的高强度协同联动。三者相互建构、彼此强化，共同形成动态循环的“催化-敏捷-涌现”生成回路(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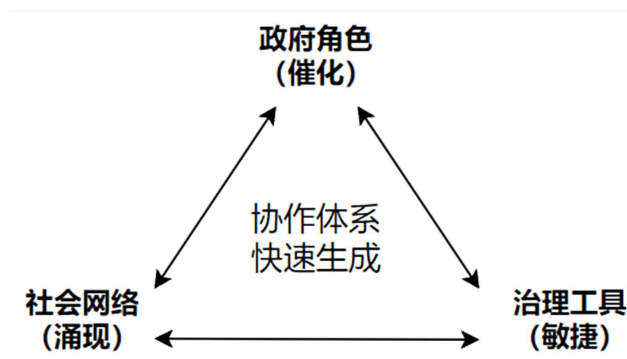


Figure 1.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istic mechanism for urb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opportunity crises (author's creation)

图 1. 机会型危机下城市协作治理的三维机制框架(作者自制)

4.1. 第一维度：作为战略催化者的政府角色转型

在传统的危机响应中，政府常扮演“指挥控制者”或“资源调配者”的角色[14]。然而，在流量冲击的初期，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和多元的行动者，政府需要向战略催化者转型[15]。政府的转型体现在三个方面：1) 政府需在危机爆发初期，需要迅速对事件性质进行定义，从而为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提供清晰的指引和共同目标。2) 政府需要迅速释放并兑现关键性的资源，用实际行动向社会传递政府解决核心矛盾的决心与能力，从而降低其他主体的参与风险与观望情绪。3) 政府需超越传统的科层框架，主动建立多元主体对话或非正式平台，为横向协作关系的建立提供基础框架。

4.2. 第二维度：作为敏捷媒介的治理工具创新

在时间被极度压缩的压力情境下，传统依赖于科层传递、文件流转和会议协商的治理工具效率低下，所以想要协作做到快速生成，就要求治理工具组合实现向“敏捷性”的全面升级，主要体现为三类工具

的融合：1) 数字赋能工具。利用大数据、社交平台等数字化工具，对人流密度、服务缺口等信息进行实时感知与智能判断，并将分析结果直接转化为调度指令。2) 情感联结工具。通过真诚沟通或者温情叙事的构建与传播等，在短时间内构建起深厚的情感认同与道德共识。3) 制度弹性工具。在恪守安全、公平等底线原则的前提下，鼓励性地出台一些柔性政策，为市场与社会主体提供合法的试错空间与行动自由，帮助他们能够创新性参与其中。

4.3. 第三维度：作为涌现性结构的社会网络重构

压力下的有效协作最终要落脚在具体行动者上。巨大的流量冲击打破了常态下的社会网络格局，催生了一种“涌现性社会网络”，呈现出以下特征：1) 主体的多元化与跨界融合：网络迅速吸纳并整合了传统治理体系外的关键行动者，如外地游客、网络主播、跨地域供应链等。2) 结构的任务驱动与扁平化：淄博烧烤事件中各类社会主体围绕“维护城市秩序”这一核心临时目标快速集结，依靠社交渠道实现信息的多点扩散，形成扁平又高效的临时性协作行动架构。3) 功能的自适应与学习性：网络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它能够根据压力变化和反馈信息即时调整分工与合作模式，实现治理行为的动态优化与高效适配。

这三个维度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有机整体。催化型政府不仅直接启动了社会动员，也决定了优先开发和运用哪些敏捷性治理工具；而这些工具的应用又便利了政府管理，塑造了涌现型社会网络的构建与互动模式。本文后续将以此三维协同机制为理论透镜，深入剖析淄博案例，详细阐释在流量周期的各阶段，政府、工具、网络三者如何具体互动与协同，希望为数字时代下面对新型“机会型危机”的城市，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与实践指引。

5. 案例实证：三维机制如何驱动“淄博协作”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多源二手资料的收集与交叉验证。资料来源包括：1) 权威媒体报道，涵盖《人民日报》、新华网、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在2023年3月至8月期间关于“淄博烧烤”现象的相关报道与评论；2) 官方政策文件，包括淄博市人民政府及文旅、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的公告、工作方案与会议纪要；3) 短视频平台公开数据，包括抖音、快手上高热度相关视频的文本内容与评论区信息。通过对上述三类来源的交叉比对与一致性检验，本研究力求在现有条件下确保案例发现的真实性与稳健性。

2023年春季爆火的“淄博烧烤”现象，短时间内涌入数百万游客，对当地公共服务体系构成超负荷压力。烧烤爆火期间，淄博文旅消费市场迎来井喷式增长^[16]，短时间内数百万游客的涌入，让当地交通疏导、餐饮供应、市场监管、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承受超负荷压力，而这类由正面流量引发的突发挑战，既无预先制定的应急预案，也无成熟的专业协作网络可循，传统科层制、指令式的治理模式难以适配。面对此次机会型危机，淄博市并未采取“限流管控”的被动应对方式，而是快速响应、主动作为，在短时间内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联动，构建起高效运转的协作治理体系。

5.1. 催化型政府角色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国性关注和极大的流量压力，淄博市政府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常规管理者向战略催化者的关键转型，这一转型贯穿于危机响应的全过程。

首先，淄博政府在舆论发酵初期及时为“烧烤热”定性，市委、市政府没有将其视为需要严控的“治安隐患”或“环境卫生负担”，而是果断将其定义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机遇与形象展示窗口，明确提出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让游客吃得放心、玩得开心”的总体方针。实现了治理方向的调整，将各部门

和全社会的预期从“防御管控”引导至“主动服务与价值创造”，为后续所有柔性、创新性举措提供了合法性与统一的行动共识。

其次，政府通过一系列公共资源的投入，向社会传递了坚定信号，比如全面开放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供游客使用，迅速增设临时公厕、开通“烧烤专线”公交。这些举措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服务补充，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让市场和社会看到，政府不仅让渡了自身的“特权空间”（机关院落）而且快速调动公共资源，率先行动做出了一个高度可信的承诺——“接待好游客是当前全市压倒性的优先任务”。

最后，政府改变以往试图包办一切的模式，而是着力搭建促成多元协作的基础设施。例如，牵头成立“淄博市烧烤协会”，将分散的烧烤业主组织起来，建立行业自律与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跨部门联动的“烧烤经济”工作专班，打破文旅、城管、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壁垒，实现问题的一站式解决与协同处置；设立政务新媒体矩阵“游客建议直通车”，为外部反馈进入决策系统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这些平台建设，将政府的催化作用从理念与资源层面，延伸至促成社会横向联结的关系架构层面。

5.2. 敏捷性治理工具

在催化型角色的指引下，淄博市创新性地组合运用了三类敏捷工具，不仅加速了响应速度，还凝聚了社会共识，也释放了社会活力。

数字赋能工具帮助淄博市进行实时感知问题，以及智能调度资源。淄博市政府依托“智慧淄博”平台，与高德、百度等地图服务商合作，实时发布“烧烤店热度地图”、停车场空位信息、交通拥堵提示；通过政务新媒体、短信提示等渠道，每日发布“烧烤攻略”“避坑指南”与温馨提示。数字工具处于治理体系的中枢，将传统的“事后报告后开会部署”的长链条压缩成为“实时感知 - 自动提示 - 即时调控”的短回路，极大地实现了治理节奏与流量波动的同步。

情感联结工具帮助道德与情感相互连接。淄博市官员走访烧烤摊、与游客亲切互动、商家诚信经营、市民自发提供帮助的“温情故事”，这些各式各样的情感动员叙事被迅速建立起来。将一场商业消费行为，升华为关于“诚信”“好客”“知恩图报”的道德实践和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工具让“维护淄博”从一项外部要求，内化为市民和商家的集体荣誉感和道德责任，形成了强大的软性规范，显著降低了对投机行为进行监督与约束的社会成本。

制度弹性工具辅助管理。对于烧烤经营政府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关停或限制，而是快速出台了临时性、指导性的“烧烤经营规范”，允许烧烤店在确保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临时性扩大经营场地；对首次轻微违规行为以劝导教育为主。这些弹性安排体现了“底线思维”与“包容审慎”的结合，在明确“什么绝对不能做”的同时，为市场和社会主体探索“如何能做得更好”留出了充足的试错空间和创新自由，激发了基层应对复杂情况的智慧。

5.3. 涌现性社会网络

在政府催化与敏捷工具的双重驱动下，一个具有典型“涌现”特征的社会共治网络迅速形成并高效运转。

网络主体首先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和跨界协调的特征。协作网络迅速超越了传统的“政府 - 商家”二元结构，吸纳了更多的新角色，比如外地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对淄博状况进行实时评价与监督，成为外部监督网络；本地市自发组成“爱心车队”免费接送游客、充当向导，成为志愿服务网络；而网红主播与探店博主凭借其影响力，既充当了宣传员的角色，也扮演了民间议事员的角色，他们反馈常被政府采纳，如淄博市政府听取意见设立“外地游客意见建议直通车”。这些异质性主体的涌入，带来了传统科层体系之外的信息、资源和解决方案，形成了一种新兴的功能互补的社会网络。

其次，网络结构呈现出任务驱动与高度扁平化的特征。淄博烧烤爆火过程中“保障游客极致体验”是贯穿始终的任务目标，众多主体将这一目标看作大家共同的任务，例如当地市民自发组织起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主动提供义务接送、引导咨询等服务；网络社群中，“淄博人”集体呼吁维护家乡声誉，形成“谁砸淄博的碗，就砸谁的锅”的民间共识；许多市民主动为排队游客赠送饮品、本地小吃。于是许多协调并没有通过政府层层下达，而是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在商家之间、志愿者之间、游客与本地人之间横向完成，这种扁平结构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播和问题解决的效率。

最后，网络功能呈现出功能的自适应与学习性，即网络展现出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淄博市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到完美，在初期也出现过众多问题，比如爆火初期出租车不打表，被游客拍摄视频曝光于网络，倒逼政府部门做出即时响应与纠正，推动成立行业自律联盟。在获得初步的局部成功后，淄博市迅速推广，如某个街区创造的排队引导模式，也通过网络快速扩散到其他区域。可见，网络不仅是执行的载体，更是一个分布式的问题感知、创新实验和经验扩散系统，使整个协作体系能够在动态压力中持续优化。

5.4. 对比讨论与潜在风险

2023年国庆期间南阳迷笛音乐节也曾因正面事件获得巨大关注(4天接待乐迷15万人次，创迷笛30年最高票房纪录)[17]，但却因露营区大规模失窃与舆情应对失当导致形象重创，两相对照，南阳的失利表现在三维框架的缺失：首先政府未能在危机初期快速定义“服务优先”的价值框架，也未能及时搭建协作平台；其次舆情响应滞后、信息沟通失范；最重要的是社会层面则因谣言扩散形成“趁乱下手”的负面集体行为，而非自发的共治网络。可见，当这些条件缺位时，即便流量涌入的规模再大，也可能导致失败，而这正是淄博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

尽管淄博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协作治理模式仍存在局限性与潜在风险。首先，资源过度集中的挤出效应。在“烧烤热”期间，全市行政资源、公共注意力与社会资本高度集中于与烧烤相关的文旅消费领域。当几乎所有部门的工作都围绕烧烤转，其他常规工作会受到一定影响。这种资源的超常规集中，可能对城市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构成挤压。其次，运动式治理的可持续性挑战。淄博的协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度动员的“战时状态”。但这种高强度、非常规的治理模式能否持续，是一个关键问题。最后，社会网络的脆弱性。由“涌现”形成的社会网络虽然灵活高效，但其结构相对松散，缺乏制度化的约束和长期激励机制。一旦外部压力消失或政府催化力度减弱，这种网络可能迅速瓦解，其积累的社会资本也难以自动转化为常态治理的资源。

这些局限性与风险提示我们，三维协同机制的效能高度依赖于特定情境与外部压力，其从“应急”到“长效”的转化仍面临一些障碍。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机会型危机下城市协作治理体系的快速生成，依赖于政府角色转型、治理工具敏捷升级与社会网络重构三大系统性转变，三者构成的“催化-敏捷-涌现”回路是协作体系在近乎零基础条件下得以快速生成的核心机制。

这一发现具有双重意义。理论层面，本研究将协作治理理论从传统威胁型危机情境拓展至机会型危机情境，揭示了此类危机中协作目标兼具“把握机遇”与“防范风险”的双重性，并将政府角色、治理工具与社会网络纳入统一的动态分析框架。实践层面，城市应推动政府角色转型、储备灵活治理工具并培育社会合作基础，从而将流量冲击转化为治理韧性与发展资产。

本研究主要依赖二手资料进行分析，虽通过多源交叉验证提升了论证的可靠性，但由于时间限制等

情况,未能对一线行动者进行系统访谈,因此在对深层动机、微观互动细节及协作中的隐性张力等方面的解释力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进一步验证和丰富本文发现。此外,淄博案例具有其特定情境,如中等城市规模、转型期共识强、事件情感基础好等。这一三维协同机制在不同规模、不同禀赋城市中的适用形态与效能,仍需更多比较案例加以检验。最后,对协作体系在流量退潮后的长期演化,亦有待持续观察。未来研究可在这些方向上进一步推进,以形成更具动态性与普遍性的城市治理理论。

参考文献

- [1] 王开学, 柏小武, 汪焕军. 迎接“智理”新时代以 AI 赋能城市智慧治理[J]. 中国安防, 2025(4): 67-70.
- [2] Ben-Yehuda, H. (1999) Opportunity Crises: Framework and Findings, 1918-1994.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17, 69-102. <https://doi.org/10.1177/073889429901700103>
- [3] 周芳检, 熊先兰. 大数据背景下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的协同治理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4] 李佳慧, 张丽艳.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构建研究[J]. 改革与开放, 2017(13): 6-7, 10.
- [5] Boin, A. and 't Hart, P. (2003) Public Leadership in Times of Crisis: Mission Impossibl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 544-553. <https://doi.org/10.1111/1540-6210.00318>
- [6] Rhodes, R.A.W. (1996)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44, 652-667.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48.1996.tb01747.x>
- [7] Provan, K.G. and Kenis, P. (2007) Modes of Network Governance: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 229-252.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m015>
- [8] Mitchell, M. (2009) Complexity: A Guided To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Holland, J.H. (1998) 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丁会彤. 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的应急协作网络形成机制研究——以郑州“7.20”特大暴雨为例[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 95-104.
- [11] 崔英雪. 基于全球治理理论的公共危机管理国际协作机制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 [12] Boin, A., 't Hart, P., Stern, E. and Sundelius, B. (2005) The Politics of Crisis Management: Public Leadership under Press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90880>
- [13] 吴晓林、左翔羽: 探索“流量城市”发展治理新路径[EB/OL]. <https://www.jicengzhizhi.com/2025/1110/30168.shtml>, 2026-01-15.
- [14] 孙永祺.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治势能与执行资源的耦合逻辑及协同路径研究[J]. 领导科学论坛, 2023(11): 105-109.
- [15] Kapucu, N. (2014)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Managing Emergencies and Crises. https://doi.org/10.1007/978-94-017-9328-5_13
- [16] 赵凯丽. 媒介化时代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研究: 以淄博烧烤出圈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海口: 海南师范大学, 2024.
- [17] 侯敏. 新的城市名片: 作为媒介的户外音乐节对城市形象的塑造研究: 以合肥市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2024.